
论章学诚在文学史上的贡献

钱志熙

内容提要 章学诚的文论，历来批评史著作多有阐述，但章氏在文学史学方面的卓越见解与其所建构的文学史体系，却未被学者所充分注意。章氏的文学史学是其整体学术史的一部分，体现其所提倡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法。他以“诗教”为核心建立了纯文学的概念，通过辨析“六艺之文”、“战国之文”、“后世之文”三种不同形态的文学之间的源流演变来建构其文学史体系。它的要点是古代的文学源出于六艺，体备于战国诸子之文，而流变为汉魏六朝的文集。他所建构的文学史体系，深层次地揭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真相。本文尝试对章氏的《诗教》、《言公》、《文集》、《诗话》等篇所包含着的极为丰富的文学史见解进行初步的阐述，认为章氏的文学史学无论在学术方法还是具体观点上，对今天的文学史研究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章学诚 《文史通义》 文学史学

章学诚是与唐代刘知几并称的中国古代两位最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在文学研究方面也有独特的贡献。他的文学观点与批评主张，为近代以来的批评史研究者所普遍关注，一般的批评史专著，都会对其重要的理论观点做出较有体系的论述。但是，章氏的文论实具有多层次的特点，要对它做出全面把握与准确评价，我感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有，章氏在文学研究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学术贡献被近现代批评史界基本上忽略掉了，那就是他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宗旨的自觉追求中所形成的文学史观，以及他对古代文学源流演变的一系列富于创见性的学术观点，从多方面揭示出中国文学史的发展真相。他的见解不仅超越了并时的文学史家，而且对于今天的文学史研究，无论是方法还是具体的观点方面，都有深可资取的价值。本文仅就浅尝所得，试加论述，以为研究章氏文学史学之初阶。

—

章氏论学最基本的宗旨，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它无疑是中国古代学术中最重要的、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方法论。章氏的这种方法的来源于广义的校雠学，其论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的校雠学方法云：

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于此。^①

又其论班固《艺文志》云：

^① 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一，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45页。本文所引用章氏著述的版本为三种，一为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二为《章氏遗书》刊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三为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汉志》最重学术源流，似有得于太史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卿《非十子》之意。此叙述著录，所以有关于明道之要，而非后世仅计部目者之所及也。^①

可见章氏最基本的学术宗旨，就是通过辨析、考镜学术的源流，来阐明道术的精微，他认为这是刘氏校讎群籍、班氏叙录艺文的方法与宗旨所在。这个意义上的校讎学，也就是今人所说的学术史的研究。章氏自己正是从刘《略》、班《志》出发，并全面追寻先秦的遗绪，对后来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分合演变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的学术源流关系的整体把握。这即是章氏所说的“古人之全体”，其意义在于明道，由此而衍为学术的源流，则为文与史两端。他的《文史通义》就是阐述他称之为“古人之全体”这种整体性的学术史。他认为当时流行的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的治学方法，“不知特为一经之隅曲，未足窥古人之全体”^②。还有，他所说的“道”或“理”，在概念上虽受理学家、古文家的影响，但在内涵上则与前人不同，他的《原道》篇，就是专门阐述他的“道论”的，他说：“古文著《原道》者三家，淮南托于空蒙，刘勰专言文指，韩昌黎氏特为佛老塞源，皆足以发明立言之本，鄙宗旨则与三家又殊”，“篇名为前人叠见之余，其所发明，实从古未凿之窠”^③。其实他所说的“道”，就是事物发展之理，也可以说是文化与文明的发展之理。这是接近于后来的社会科学的宗旨，从这一点上说，他是超越时人的。这也是他的学术虽然不被乾嘉学派所重视，但却深受近现代文史学者推崇的原因。

章氏的学术，对当时人所说的考据、义理、辞章三者都有所吸取，有所勘别，其真正造诣则是借鉴与吸取汉代司马迁、刘向父子、班固，以及梁代刘勰、唐代刘知几、宋代郑樵等人的学术思想与方法，形成他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史学体系。从今天的理解来看，章氏的学术，也可以说已是一种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它对传统的经学实际上是有所消解的，对传统的史学与文学的研究则有很大的提升。当然，不能否认，传统儒家的先王教化、圣贤道统的形上观念，对章学诚还是有一定的制约的，他追溯学术之源，止于先王教化、六艺之学、诗教等范畴。尽管他将这些概念改造为广义的文化源头、学术源头、文学源头的意思，但来自于经学与儒学的一种价值评判，使他对后世学术与文学的发展成就没有做出合理的评价，也妨碍了他更进一步地追溯古代文化发生的源头，并阐明其原理。可以说，在章氏的学术体系中，价值评判体系的复古、守旧甚至迂腐倾向，与其卓越超前的学术思想、学术方法之间，可以说是一种矛盾。也正是这种矛盾的表现，将其学术中许多光辉的地方掩盖住了。他的文学史学之重要贡献之所以被忽略，也是因为这一原因。

章氏的文学理论，在当时也可以说是别出一格的。他不是纯文学家，也不以具体的鉴赏与批评见长。但是他通过对古今文学源流正变的把握，加上他个人在古文写作方面的经验，建立起一套属于他自己的批评标准，能够辨析文学方面的“群言之得失”，对元明以来古文及诗赋创作、批评方面的一些弊病，能够中肯地指摘出来。《文史通义》中的《文德》、《文理》、《古文十弊》、《诗话》等篇，比较集中地表达了他的文学批评观点。近代以来的文学批评史家如郭绍虞、王运熙、张少康诸家，都对其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建树做出较高的评价。郭绍虞对章学诚的学术宗旨做了比较深入的抉发，指出“章氏之学，以识见长”，“能见其大，所以不局于一端，举凡昔人所谓经学、理学、心学、文学之分而综合为一；能见其精，所以仍贵专门，虽合昔人德行、文章、经济、事功诸学而自成一家人”^④。指出章氏能综合而又贵专门，是符合其学术宗旨的，研究章氏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也应该特别注意这一点。郭氏对章学诚文学批评的介绍，着重于其古文理论与清真的文章主张，章氏的清真，是从文心与文理、文律来讲，郭氏举其《与邵二云书》“仆持文律，不外清真二字”论云：“实斋文

① 《校讎通义》卷二《补校汉艺文志第十》，《文史通义校注》，第994页。

② 《文史通义校注·原道下》，第138页。

③ 《章学诚遗书》卷九《与陈鉴亭论学》，文物出版社《章氏遗书》刊本。

④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02页。

论，一言以蔽之，清真之教而已。”^①章氏论“清真”之义曰：“清则气不杂也，真则理无支也。此二语知之甚易，为之甚难。”^②（《与邵二云书》）又云：“昔李白论诗，贵于清真，此乃今古论文之准则，故至今悬功令焉。清真者，学问有得于中，而以诗文抒写其所见，无意工辞，而尽力于辞莫及也。”^③元、明以来，古文、时文及古近体诗歌的创作与批评上，形成了一些人为的、过于形式化的体格规则，有不少实属死法。章氏之所以能打破这些陈规陋习，指摘流弊，正是因为他能够以清真为论文的原则。他所说的清真，是要返回到文章与文学的本然状态。所以他写作古文，能不避被人视时文要素的一些修辞方法，这因为他以表达内容为关键，不拘于所谓的古文义法。郭著之后的诸家文学批评史，对章氏文学理论的分析更趋系统细密，如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批评史，将章氏的文论概括为“以史为宗的古文观”、“文德论”、“文理与古文十弊”三个方面来论述^④。张少康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认为：“章学诚所持属于广义的文学观念，他虽然不属于桐城派，但他对文章的看法和桐城派是基本一致。”张少康还认为：“作为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章学诚的文学观念是明显地倾向于复古和守旧的，但是他和一般的道学家和古文家都不同，对作为艺术的文学的特点还是有其独到的精辟见解的。”^⑤张著注意到章学诚对文学的艺术特点的独到见解，尤其是比较深入地分析了章氏注重文学创作的形象艺术问题，实为前此的研究者所忽略。这其实是章氏纯文学观得以建立，并能够建构独特的文学史体系的关键，对此下文会做具体的论述。一些有关章学诚研究的专著，也试图概括章氏文学理论的体系，如仓修良等的《章学诚评传》设“别具一格的文学理论”来评述章氏的文学观点，并将其归纳为“文贵‘明道’‘用世’”、“倡导‘文德’”、“‘文理’说”、“‘清真’说”这样几点，就章氏论文的基本范畴来说，应该说是比较全面了^⑥。王义良的《章实斋以史统文的文论研究》，则是强调章氏的文学理论宗旨与建构方式是以史统文，对此进行极为深入的阐述，并以此重构其文学理论的体系。其中第三章第四节壹“通变的文学史观”，虽然只提到章氏文学史观强调通变的特点，并未揭示其文学史学的全体，但已经注意到为诸家所忽略的章氏文学史观^⑦。

章学诚的文论，是与其史论相倚而生的，而其史论与传统的狭义史论又有所不同，因为他所持的是“六经皆史”的观点，传统的经、史、子、集被他整合为文与史两者，所以其中又包括着传统上属于经学的一部分。但是章氏一方面在整合，一方面又十分重视古代学术、文章的源流与分野。我们要研究他的文学理论，就要特别注意他的学术体系上的这个特点。其中的一点，就是不能仅以罗列其范畴，简单地引述其观点为满足。因为这种作法虽然让人感到条理清晰，但往往无法穷尽其义蕴，也无法呈现古代理论批评家们的运思状态与具体语境，因而无形中消减了其理论与批评的生动与丰满，也影响了我们对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价值的认识。章氏学术语言中的“文”及“文辞”，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的“文”与“文辞”，是指一切著述中的语言艺术，其中包括纯文学创作，也包括非文学的写作。两者之间界限是相对的，其共同的连结之处则在同是语言艺术的运用。由此而形成的一种文论，也是一种广义的文章学的理论，即关于写作艺术或语言艺术的理论。如他说：“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无华朴，味之不能无浓淡，势也。”^⑧其《易教下》论六艺之文曰：

《易》之象也，《诗》之兴也，变化而不可方物矣。《礼》之官也，《春秋》之例也，谨严而不

①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621页。

② 章学诚《与邵二云书》，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三，第666页。

③ 《文史通义校注·诗话·附录》，第569页。

④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下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0—245页。

⑤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1、382页。

⑥ 仓修良、叶建华《章学诚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1—396页。

⑦ 王义良《章实斋以史统文的文论研究》，高雄复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214页。

⑧ 《文史通义校注·史德》，第221页。

可假借矣。夫子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君子之于六艺，一以贯之，斯可矣。物相杂而谓之文，事得比而有其类。知事物名义之杂出而比处也，非文不足以达之，非类不足以通之；六艺之文，可以一言尽也。夫象欤，兴欤，例欤，官欤，风马牛之不相及也，其辞可谓文矣，其理则不过曰通于类也。故学者之要，贵乎知类。^①

从这样的角度来定义“文”，不仅“六经皆史”，同样也可以说是“六经皆文”。从这个方面来说，也可以说章氏是继续中国古代的文论家的传统。中国古代文论家文学理论的基础，是建立在广义的“文”之上，因为中国古代的文人文学本来就是从政教传统中孕生出来的。但是，中国古代的纯文学理论与批评同样是很发达的，并且广义的文章学的理论其精神也是指向审美境界的，这也是章学诚文章学理论的特点。所以他的文章学是属于美学范畴的。他的“文”和“史”其实也可以概括与“美”和“真”。甚至可以说是“诗”和“真”，因为美的精华在于诗。章氏论学术，最重性情，这在一般的学术思想家中是极罕见的。他的学贵性情之说，也少有学者探其渊源。其实我们知道，中国古代诗学的最基本的范畴就是“性情”，章氏的学贵性情说，使他的学术带有一种诗性的色彩。有性情的学术里面，即包含美的精神，诗的精神。而章氏所说的理想的学术，正是包含着这个因素。从这个意义说，我们将章氏的文史之学概括为“美”与“真”或“诗”与“真”，应该算是一个合理的发挥。

正是由于章氏的广义的“文”的概念指向一种审美的境界，所以他才能建立起纯文学的观念，并进而在其文史之学的整体上，为纯文学找到了确定的位置，形成其独特的文学史学。从刘向父子、班固开始，就以“诗赋”来归纳纯文学，在整个学术源流中为纯文学找到位置。班氏《艺文志》更是提出“赋出于古诗之义”，“春秋聘问之道歌”，“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职之赋作”的观点，为从“诗三百篇”到战国以降文人辞赋这一纯文学史找到了一个重要连接处。这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史建构的开端。章学诚的文学史学，正是继承刘、班而发展出来的。其文学史学的要义，归结地说，就是从六经皆先王政典、为先王教化之事的观点出发，为文学找到了先王诗教这个源头，并且认为后世的文学都是从诗教这个源头发展而来的：

学者惟拘声韵为之诗，而不知言情达志，敷陈讽谕，抑扬涵泳之文，皆本于《诗》教^②。

这是章氏为他的纯文学史观奠定的一块最重要的基石。表面上看，他的观点似乎很陈旧，这也许正是他的文学史学被忽略，《诗教》等篇包含的其建构文学史学努力，被视为一般的经学陈言的原因。事实上，他将原属儒家经学范畴的“诗教”这个概念发展为其文学史学的核心概念，更将“诗”这一概念合理地扩展为一个包含了纯文学的全体的范畴，为其纯文学理论、纯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学建立起稳固的基础。这个文学史上巨大的发展，却不幸被当作经学的陈言、史学的附庸而普遍地忽略了。

二

章学诚的文学史学，是建立在他自觉实行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法的基础上的。这是章氏学术的整个指导思想，当然也是其文学史学的基本方法。他是在整个学术文化与文献源流的整体中阐述文学的发展历史的，这符合中国文学史的实际情况。因为在中国古代，文学界域的逐渐形成，内涵的逐渐清晰，是经历过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的。《文史通义》中的《诗教上》、《诗教下》两篇，正是章学诚所建构的整体文学史。其基本的结构是，通过“诗教”一义，来确立文学的本质，也即文学史的本体。他对文学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认为后世的文学渊源于“六艺”中的“诗教”：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后，六艺惟《诗》教为至广也。敢问文章之用，莫盛于《诗》乎？曰：

① 《文史通义校注·易教下》，第18页。

② 《文史通义校注·诗教下》，第78页。

岂特三代以后为然哉？三代以前，《诗》教未尝不广也。夫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古无私门之著述，未尝无达衷之言也。惟托于声音，而不著于文字，故秦人禁《诗》、《书》，《书》阙有间，而《诗》篇无有散失也。后世竹帛之功，胜于口耳；而古人声音之传，胜于文字；则古今时异，而理势亦殊也。自古圣王以礼乐治天下，三代文质，出于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于官守，《礼》之质也；情志和于声诗，乐之文也。^①

后世的人文文学，是一种个人著述，属于“私门著述”之一，但文人文学是在文学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发生的。文学的源头，并不始于文人文学，也不始于书面的著述，而是始于口头的创作。在这里，章氏清晰地指出这个早期文学史的事实：“后世竹帛之功，胜于口耳；古人声音之传，胜于文字。”章氏又著有《言公》上中下三篇，其基本观点是认为古人为道立言、因事立言；有立言之功，无著述之私。他写作本篇的目的，是为了批评后世因以著述、文章为个人所有，而使道术裂、人心坏，即所谓“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争于文，则言可得而私矣；实不充而争于名，则文可得而矜矣”^②。但从学术史的意义来看，则是揭示出典籍与文章从早期的群体著作、口耳相传到后来的私家著述、书于竹帛的发展过程。这个重要的结论，同样也揭示早期文学史的发展真相。古代文学，有一个从早期的口耳相传到后来的书面写作，从早期的群体的抒情、言志、叙事到后来的个体的抒情、言志、叙事，从早期的无名氏、无著作权到后世文人个体、有著作权，这样一些方面的重要发展^③。用章氏的概念来说，就是文学史经过“言公”时代的文学到后世“言可得而私”的个体创作的时代。章氏在《言公上》中从“言公”的角度出发，引司马迁的“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④之语，来揭示《诗经》教化功能的生成原因。同时在《言公下》中，他又指出后世文人的写作特点：

于是泛滥艺林，回翔艺苑；离形得似，弛羈脱轡；上窥作者之指，下挹时流之撰。口耳之学既微，竹帛之功斯显。^⑤

事实上，正是由于口耳之学微，竹帛之功显，中国古代文学才得以迅速地发展。所谓辞章之学，正是口耳之学衰落后发展起来的。而“文学”这个词的根本意义，也正是指作为泛学术性的、古代文人的文辞之学，其重心正是落在文人文学上面的。撇开章氏贬低文人文学的价值评判不论，他对这一文学史发展真相的揭示，则是富于创见。虽然在章氏之前，刘知几等也已经指出过从口耳到竹帛的变化情况，但章氏从言公的角度出发来阐述这个问题，其深度是远超过古人的。

上引《诗教上》中，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章氏从“深明于道术精微”的学术思想出发，在建构文学史时，一开始就重视文学的本质，即他所说的“达衷之言”，亦即表达内心情志的一种语言艺术。这种语言艺术的重镇即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的诗歌，所谓“情志和于声诗，乐之文也”。章氏论诗，重视诗歌具有乐的本质，这是与他以六艺为先王政典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作为先王之政典的诗歌，是先王礼乐教化的一部分，诗是以乐的形态呈现的。从学术的渊源来讲，章氏的重乐的诗学观，是接受了郑樵以歌谣、乐章为诗之本体，认为诗在声不在义的观点^⑥。更重要的一点是，章学诚对“诗”这个概念的使用，是带有辨析性的，他批评后世“论文拘形貌之弊”（《诗教下》），所以并非简单地从体裁形式方面来体认何者为诗，何者非诗，而是从艺术的实质精神方面来辨析性地使用“诗”这一范畴。他指出：

至于声韵之文，古人不尽通于《诗》，而后世承用诗赋之属，亦不尽出于六义之教也。^⑦

① 《文史通义校注·诗教下》，第78页。

② 《文史通义校注·言公中》，第182页。

③ 参看钱志熙《从群体诗学到个体诗学——前期诗史发展的一种基本规律》，《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文人文学的发生与早期文人群体的阶层特征》，《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④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班固《汉书》卷六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

⑤ 《文史通义校注·言公下》，第194页。

⑥ 郑樵的观点，详见其《通志·乐略》。参见拙著《汉魏乐府的音乐与诗》（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引言部分。

⑦ 《文史通义校注·诗教下》，第79页。

这就是首先确立了诗赋的本体,并据此衡鉴古今的创作。于是就出现这样两种情况:即古人的声韵之体,并非都属于诗;后世的诗歌创作,也有不符合诗的六义标准的。章氏的“六义之教”,虽然使用了传统儒家诗学的范畴,但他同样是思辨性地使用这个概念的,其实质即指诗的本义。对于声韵之文不尽通于诗,章氏具体地指出古代经子文章中普遍使用韵文之体,后世杂艺百家也有借用五七言诗的体裁来传播知识这样两种情况:

演畴皇极,训诰之韵者也,所以便于讽诵,志不忘也。六象赞言,《爻》、《系》之韵者也,所以通卜筮,赞幽玄也。六艺非可皆通于《诗》也,而谐言不废,则谐韵协律,不得专为诗教也。传记如《左》《国》,著说如《老》、《庄》,文逐声而遂韵,语应节而遽协,岂必合于《诗》教之比兴哉?焦贡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经部韵言之不涉于《诗》也。《黄庭经》之七言,《参同契》之断字,子术韵言之不涉于诗也。后世杂艺百家,诵拾名数,率用五七言字,演为歌诀,咸以取便记诵,皆无当于诗人之义也。而文指存乎咏叹,取义近于比兴,多或滔滔万言,少或寥寥片语,不必协韵和声,而识者雅赏其为《风》、《骚》之遗范也。故善论文者,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于形貌也。^①

一句话,衡鉴诗的标准,不在于体制之有韵与无韵,而在于“存乎咏叹”的创作性质与“近于比兴”的表现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章氏学术体系中的“诗”这一范畴,即是他所理解的真正的文学,亦即纯文学。所以《诗教》上下篇,并非专论《诗经》及先秦诗教,而是使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法,依据上述文学要义来梳理古今纯文学的源流。其所论不仅一般的经学家所不能见及,亦非一般的文学史家所能言。他关于文学史的一系列的见解,的确是揭示真相的学术发现,而非由先入之见、由概念捏合的架空之论。

《诗教上》中,章学诚具体地阐述了中国文学史发展源流,它的要点是古代的文学源出于六艺,体备于战国诸子之文,而流变为汉魏六朝的文集。他首先提出战国为文学发展之关键的观点,并认为战国之文源出于六艺:

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战国之文,奇邪错出,而裂于道,人知之;其源出于六艺,人不知也。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于《诗》教,人愈不知也。知文体备于战国,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知诸家本于六艺,而后可与论战国之文,知战国多出于《诗》教,而可与论六艺之文;可与论六艺之文,而后可与离文而见道;可与离文而见道,而后可以奉道而折诸家之文。^②

六艺即六经,其中《诗》与《乐》,都是先王政教之典的传述,并非私人的著作。用我们今天的观念来阐述,古代的各种经典,都是从原始时代到文明时代,各民族的制度、思想、文化的集成,不同于后世思想家的一家之言,文学家之个体创作。文学之要义有二:一为源于人类抒情言志、娱情悦志的天性的表现;二为源于人类在语言上的审美追求,故其性质为抒情言志的语言艺术。这两点用章氏的话来说,就是“文指存乎咏叹,取义近于比兴”。正因为上述的原理,所以人类自原始时代开始,就有了文学的创造。六艺即为原始以来文化之集成,则文学的渊源,自然也存乎其中,而《诗经》则为六艺文学的核心。《诗经》之外,论文学之质,则《易》、《书》、《礼》、《春秋》之中皆有叙述、有抒情、也有比兴,而“修辞立诚”,则为六艺的共同宗旨。用今天的术语来说,构成中国文学的两大主体的叙事之学与抒情之学,都可追溯于六艺之文。可见六艺的全部,虽非即是文学,但其中具有文学因素,所以章氏论文学之源流,溯于六艺。其实际的观点,是认为《诗》教的文学,是建立在六艺之文的基础上的。文学之道,也包含在六艺之文中,其要旨仍为“文指存乎咏叹,取义近于比兴”。章氏的这种观点,比起刘勰《原道》、《宗经》、《征圣》的文学观念,更具一种科学的分析性。这是他在传统儒家的文学观的基础上,根据文学本体的辨章所得,

① 《文史通义校注·诗教下》,第79页。

② 《文史通义校注·诗教上》,第60页。

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建构先秦的文学史,如果理解与定位六经文学的性质,仍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章氏“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的观点,常为学者所引用,可以说是章氏文学史学中唯一受到广泛重视的一个观点。但是,章氏以战国诸子文章为文学史上从六艺之文、先王诗教到“后世之文”的最重要的承转之处的全部用意,以及这个观点对于揭示文学史真相的意义,却未必为学者所尽知。首先,章氏所说的“文体备”,一般都认为是指文章体裁的完备,如叶瑛的《文史通义校注》就引刘勰《宗经》和章氏本人的《论课蒙学文法》关于各种体裁分别源于六经的看法,来注释章氏此语,认为章氏观点“是后世之文并导源《五经》,特至战国而其体始备”^①。这种看法有代表性。这当然也是章氏所说的“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的一种意思,但并非其全部意思。他说的“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的更重要的意思,是指后世文人以文辞为专尚的个体的文学创作的体制与性质,是开端于战国时代的。所以这个文体,不完全是指体裁,更主要是指文学之体,是文学的体制与性质。我们看他后面的具体论述,即可知道这一点:

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何谓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菹也。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可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学者不知,而溯摭虞所哀之《流别》,甚且以萧梁《文选》,举为辞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别之义矣。^②

在这里,他要追溯的是文人文学的源头,即章氏所说的“后世之文”,是一种不同于六艺之文的个体创作。章氏认为这种个体创作的辞章之文的体制与性质,至战国方才具备。这是因为六艺之文,是先王政典,是道的全体反映;后世文人之文,才是个人的抒情言志、修辞骋才,是道与文的分裂,也是文的确立。而“奇邪错出,而裂于道”,从道与文的分裂而孕育后世的辞章之文的逻辑的起点来讲,正始于战国诸子之文。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战国诸子之文,虽源于先王政典与专门治术,但却是淆驳不纯,多为个人思想、情意之发抒,所以就其实质而言,已具有个体抒情、个性表现的特点。诸子之文就抒情一端而言,实源于六艺之《诗》教;就其个体抒情而言,实开后世文人之文的先端:

自古圣王以礼乐治天下,三代文质,出于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于官守,《礼》之质也;情志和于声诗,乐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诸子以术鸣。故专门治术,皆为《官礼》之变也。情志荡,而处士以横议,故百家驰说,皆为声《诗》之变也。战国之文章,先王礼乐之变也。然独谓《诗》教广于战国者,专门之业少,而纵横腾说之言多。后世专门子术之书绝,而文集繁,虽有纯驳高下之不同,其究不过自抒其情志。故曰:后世之文体,皆备于战国,而《诗》教于斯可谓极广也。学者诚能博览后世之文集,想见先王礼乐之初焉,庶几有立而能言,可以与闻学《诗》、学《礼》之训矣。^③

章氏正是在这里找到了六艺之文、战国之文、后世之文的联系与关纽,其最关键的一个范畴,仍是“情志”。先王礼乐之盛时代,是“情志和于声诗”,这里的情志并非个人的情志,而先王礼乐造成上下贯通的情志,这其实就是上古至《诗经》群体抒情的群体诗学的原则。后世的文人文学,“其究不过自抒其情志”,实为个体诗学之个体抒情原则^④。章氏在这里扬前贬后,这是他作为一个古代思想家、深受儒家诗教影响的局限,但是他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科学方法,指出诗教由充分地展示群体抒情原则到向个体抒情原则的转化,则是文学史的一个重大的发现。他还发现了从先秦到汉魏文学发展历史的一个关键,在于战国诸子之文,即他说的“百家驰说”。他在上文的自注中解释为什么说“处士横议,百家驰说,皆为声诗之变也”时说:“名、法、兵、农、阴阳之类,主实用者,谓之专门治术,其初各

① 《文史通义校注·诗教上》注,第64页。

② 《文史通义校注·诗教上》,第61页。

③ 《文史通义校注·诗教下》,第78页。

④ 参看钱志熙《从群体诗学到个体诗学——前期诗史发展的一种基本规律》。

有职掌，故归于官，而为礼之变也。谈天、雕龙、坚白、异同之类，主虚理者，谓之百家驰说。其言不过达其情志，故归于诗，而为乐之变也。”^①可见，章氏论“后世之文”源于战国，“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的关键点有两个，一是情志，一是个人著述之事专。通过“情志”将六艺之文、战国之文、后世之文贯穿起来，为中国文学史找到了一条最合理的主线。这一非凡的揭示，对于我们探索文学史，建构文学史的启发意义之巨大，是不待赘论的。因为我们一直没有为六经、诸子、史传与后世的诗赋之间寻找到合理的统一点，我们也没有合理地解释《诗经》与后世的文人诗歌之间的真正的血缘关系。章氏则创造性地发展了传统的“诗教”范畴，为文学史找到一条最合理的主线。虽然在价值的判断上无法超越其时代思想的局限，但在科学的探索上则迈出很大的一步。我们今天的文学史，无法不将诸子的文章纳入其中，但却一直难以为它找到一个妥帖的安置，在理论上缺乏如何合理地解释诸子之文的文学性质。章氏将“百家驰说”归结为诗教的流衍，则从六艺文学到百家文学的脉络就被梳理出来了。章氏的解释，当然不能认为是最圆满的了，但他毕竟为文学史找到这一系链。我们可以在他停止的地方继续探索，超越他的时代局限，为上古至中古的文学史寻找到更合理一个解释系统。

三

章学诚在以诗教为核心寻索出从六艺之文到战国之文的源流后，接着探索了从战国两汉的子史之文到汉魏以辞章为主旨的文集文学的源流，提出“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的观点。这是对文人文学前期发展历史的最重要的一个概括，也可以说是章氏最具发现价值的一个文学史观点。

章氏以诗教源流为宗旨，以古今典籍的部次分类为线索，从文学与目录学两方面，对文集这一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最重要的文献问题做了梳理，写作了《文集》一篇。本篇是对《诗教》上下篇中观点的继续，他首先追溯汉魏时代集部如何从子史歧出的历史渊源：

集之兴也，其当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风诗采之间里，敷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者也。自治学分途，百家风起，周秦诸子之学，不胜纷纷；识者已病道术之裂矣。然专门传家之业，未尝欲以文名，苟足显其业，而可以传授于其徒，则其说亦遂止于是，而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编入《新书》；相如词赋，但记篇目：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哀焉而为文集者也。自东京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自挚虞创为《文章流别》，学者便之，于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于晋代。而后世应酬牵率之作，决科俳优之文，亦泛滥横裂，而争附别集之名，是诚刘《略》所不能收，班《志》所可无附。而所为之文，亦矜情饰貌，矛盾参差，非复专门名家之语无旁出也。夫治学分而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兴，诚伪之判也。势屡变则屡卑，文愈繁则愈乱。苟有好学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质，因散而求会同之归，则三变而古学可兴。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丧实，二缶犹且钟惑，况滔滔之靡底极者？^②

六经是先王的政典，并非私家的著述，这是章氏《文史通义》中的一个基本观点，《易教》、《书教》、《诗教》及《言公》诸篇中都有专门的论述。后世的文人以篇章之文为主体的辞章文学，从其创作性质来说，是一种私家著述，但并非最早成熟的私家著述。私家著述的第一发展阶段的主要成就，不是文学创作，而是子家与史家的著述。从私家著述的角度来说，战国的辞赋家之作，是战国时期私家著述风气的产物，荀子的《赋篇》、《成相》，正是其子书著述的附庸，而屈原的二十五篇，其与子、史家的一家之言，意义正相同，甚至可以说辞赋是诸子的一种变体。可见作为文人文学之开端，后世集部文学的核心、辞

① 《文史通义校注·诗教下》，第78页。

② 《文史通义校注·文集》，第296页。

章学之重镇的辞赋，其原始的性质，亦属战国诸子著述之一种。是由思想的著述，歧为注重修辞、文有体式并以情志为先的文学著述。《校讎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

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本原，实能自成一子之学；与夫专门之书，初无差别。^①

这也是章氏对后世之文源出于战国之文，以及“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等观点的一个具体展述。班固《汉书·艺文志》论述辞赋之源流云：“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侧隐古诗之义。”^②章学诚关于辞赋的源流，是完全接受《艺文志》的看法，又从战国之文的整体上为其寻找源头，是对班固观点的发展。

“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衰。”两汉的文章体类繁多，从性质与功能来看，可分为纯文学与杂文学两类。辞赋渊源于战国荀、屈，禀承古《诗》之体，是纯文学的体制。颂、箴、铭、赞之类出于《诗经》之体，以缘饰人事为主，其性质仍与纯文学接近。其余章、奏、论、议之类，则多应用于政治与学术，但又带有崇尚辞章之艺的特点，是一种杂文学。无论是纯文学与杂文学，两汉的文章，其体制渊源多出于先秦六艺之文与子史之文。并且，两汉的作者，纯粹从事于辞章的很少，如贾谊以子家而兼有辞赋，司马迁、班固以史家而兼有辞赋，扬雄以辞赋家而兼子家，并且模拟经典。至于像马融这样以经学而兼擅辞章，更是东汉文学中常见的现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正是因为汉代的文人文学，是从战国以来的私家著述风气中发展出来的。上述这些作者，都是继承战国以来的私家著述传统而创作。所以汉代士人之著述，首重经学，次重子史，最后才是辞赋，这正是由经学、子史、辞章先后依次相继而起的中国古代学术与文学的发展历史所决定的。章学诚的“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正是对这一真相的揭示。

“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是说文集代子史而起，并且小部分继承子史的功能，大部分则发展为辞章之学。后世文人学者，仍有子书、史书的专著，甚至像扬雄、王通等人还有拟经的创作，但子、史的经典，主要是从战国到两汉时代产生的。文集不等于文学，它是中国古代典籍发展过程中自然地形成的一种形式，其中的别集为个人写作的篇章之文的集中，即章氏所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菹也”。个人写作的篇章之文，并非都是辞章艺术，其中还有主要是表达思想、阐述学问或记录事迹的篇章，它们其实是渊源古人的经学、子学、史学的。但从两汉以降，文人写作的重心，在于诗、赋、古文辞，所以章氏说：“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③章氏“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带有贬抑后世的人文文学的倾向，但不是简单的贬低，更不是否定纯文学本身，否定辞章艺术，而是从古今学术源流中辨章文学的发展历史，想寻找出“奉道而折诸家之文”（《诗教上》）这样一个判断文学史的大宗旨。其在纯文学方面，则是要以“诗教”为宗旨，对后世的人文文学的源流演变进行梳理，并且在其中阐述他的文学理想。

在章学诚建构的纯文学史中，诗赋一直处于核心位置。章氏论诗赋与别家之不同，除了论其体制、形貌之外，更重其艺术的实质。这个艺术的实质，就是前文反复介绍过的诗教的宗旨与情志内核，他以这两者为要点，来梳理诗赋之源流，批评历代诗赋之高下得失：

诗赋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节也。古者声诗立教，铿锵肄于司乐，篇什叙于太史；事领专官，业传学者；欲通声音之道，或求风教所施，询诸掌故，本末犁然，其具存矣。自诗乐分源，俗工

① 《文史通义校注·校讎通义》，第1064页。

② 班固《汉书》卷三〇，第1756页。

③ 《文史通义校注·诗教上》，第61页。

惟习工尺，文士仅攻月露；于是声诗之道，不与政事相通；而业之守在专官，存诸掌故者，盖茫然而不可复追矣。然汉魏而还，歌行乐府，指事类情；就其至者，亦可考其文辞，证其时事。唐宋以后，虽云文士所业，而作者继起，发挥微隐，敷陈政教；采其尤者，亦可不愧古人。故选文至于诗赋，能不坠于文人绮语之习，斯庶几矣。^①

虽然章氏没有全面地把握住《诗经》与后世文人诗赋的根本性区别，其对后世文人诗赋的评价，也带有复古派的倾向，但是他在郑樵的启发下，抓住歌谣、乐章到文人专尚文辞艺术的诗赋发展脉络，可以说已经抓住诗歌史的关键。

在诗赋的研究方面，章氏一些具体观点，更多是从校雠学的角度出发的。其中对刘、班叙录艺文，列赋于诗之前的做法，提出批评的意见：

赋者古诗之流，刘勰所谓“六艺附庸，蔚为大国”者是也。义当列诗于前，而叙赋于后，乃得文章承变之次第。刘、班顾以赋居诗前，则标略之称诗赋，岂非颠倒与？每怪萧梁《文选》，赋冠诗前，绝无义理，而后人效法之，为不可解，今知刘、班著录，已启之矣。^②

在《诗教下》中，他也提到《昭明文选》“赋先于诗，骚别于赋”为序次诗赋体例上的失误。这是一个专门的问题，笔者曾在《文选“次文之体”杂议》一文中做过详细的解释。刘、班列赋于诗前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赋虽出于古诗，所以标略之言称“诗赋”，但汉代的歌诗杂谣，其体制多为俗乐，在当时不仅地位不能与辞赋相提并论，而且在文体发展时间上，晚于辞赋，而魏晋以降的文人诗歌兴盛，更是代辞赋而起的。所以刘、班、《文选》列赋于诗之前，都是从文学史上文体发生、发展的事实出发的。至于《文选》别骚于赋，的确是一个不妥当的处理，但是也有其当世的原因^③。其余《诗教下》、《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中关于《文选》及班《志》序次诗赋一类文体的不妥当论议，还有不少，但都是一些校雠学范畴的观点，与其所建构的文学史整体关系不太密切。

诗赋之外，章氏在《诗话》中对小说、戏曲的源流，也做了一番梳理：

小说出于稗官，委巷传闻琐屑，虽古人亦所不废。然俚野多不足凭，大约事杂鬼神，报兼恩怨，《洞冥》、《拾遗》之篇，《搜神》、《灵异》之部，六代以降，家自为书。唐人乃有单篇，别为传奇一类。（原注：专书一事始末，不复比类为书。）大抵情钟男女，不外离合悲欢。红拂辞杨，绣襦报郑，韩、李缘通落叶，崔、张情导琴心，以及明珠生还，小玉死报，凡如此类，或附会疑似，或竟托子虚，虽情态万殊，而大致略似。其始不过淫思古意，辞客寄怀，犹诗家之乐府古艳诸篇也。宋元以降，则广为演义，谱为词曲，遂使瞽史弦诵，优伶登场，无分雅俗男女，莫不声色耳目。盖自稗官见于《汉志》，历三变而尽失古人之源流矣！^④

撇开古今学者对小说、戏曲评价之不同这一点之外，章氏为小说、戏曲做的一番“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论述，不啻为小说戏曲史的要领。其创见有为人仍未充分认识者四：一、他指出六代的小说“家自为书”，实是从其关于古今著述的源流来为小说寻找位置，小说家原本仍是古代著述的一种。六朝小说之盛行，并非纯文学的小说意识之自觉的结果，而是六朝著述之风的余衍。但六朝小说已失去专门之学性质，成为一种随意性的写作，其性质与六朝的诗赋创作是相同的。所以六朝小说创作的现象，仍然应该从章氏所说“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这个大的背景来把握。二、其概括唐代传奇与六朝小说之不同，在于专书一事之始末，不复比类为书。不但观点鲜明，而且深得要领。揭示出小说史发展一大环节。循此出发来探讨唐代小说与六朝小说之间的异同及流变，宁非今人小说史之一大课题？三、他将唐代传奇中的言情一类，与乐府古艳、六朝诗歌中的淫思古意相提并论，认为是性质相同的创作。

① 《文史通义校注·外篇一·永清县志文征序列·诗赋叙录》，第792页。

② 《文史通义校注·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第1065页。

③ 钱志熙《文选“次文之体”杂议》，《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

④ 《文史通义校注·诗话》，第560页。

这一点尤其具有创见性。将小说的源流追溯到乐府,是符合于文学史实际情况的。不但汉魏小说与乐府、辞赋有同条而生的背景,乐府中有小说的因素,《陌上桑》、《秋胡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木兰辞》,实为小说之渊源,而唐代变文、宋元话本,实兼有歌唱之体,广义来说,正属乐府之流。而唐人传奇之言情传统,的确是与六朝的乐府歌唱男女情事源流相关,其文学的性质,与唐人拟古乐府实为一脉。四、对于从小说到戏曲的自然演变,虽然也是今人研究的要点,章氏不但早得其要领,而且其余义,仍值得今日的研究者探索。可见,章学诚对小说、戏曲史的建构,虽然在价值判断上未能超越古代士大夫的观念,但其科学的方法,却使他探索到小说、戏曲史的实际。今人都认为小说与戏曲进入文学史建构,是晚近之事,甚至从西方、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著作寻找渊源,我们看到,章学诚已经将小说、戏曲极其科学地建构到文学史中,其学术的卓越的超前性,不能不令人惊叹!

章学诚文学史体系的建立,与其对文学史本体的重视与方法上的自觉分不开。在文学研究方面,章氏推崇钟、刘为代表的专门之学,讥贬不能名家之学的后世的诗话之体:

《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原注:如云某人之诗,其源出于某家之类,最为有本之学。其法出于刘向父子。)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而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此意非后世诗话家流所能喻也。^①

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传统,溯源于西汉刘、班。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上的理论探讨与批评风气兴盛,文学史的研究也随之发生。尤其是范曄《后汉书》开创了“文苑传”的体例,此后南朝至初唐的正史,都立有“文苑传”或“文学传”,并撰写系统阐述文学发展历史的文学传序或文学家传论,都可以看作是自觉的文学史著述。而著为专门之书的,则以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为代表,从体系之建构与研究方法的自觉两方面说,都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成熟的文学史研究著作。它们其实是战国以来成熟的子史著述传统在文学研究上的体现。唐宋以降,子史著述的传统衰落,文学理论探讨的风气也下降了。这个时期出现的诗话,在谈诗论艺方面虽有它们的长处,但在学术研究方面缺乏自觉的意识。所以,章氏认为它们虽沿袭古代著述之余波,但“沿流忘源”,“不复知著作之初意”。这个批评应该说符合实际的。加之作者日多,因为一方面是“论文考艺,渊源流别,不易知也”,而另一方面,“好名之习,作诗话以党伐同异,则尽人可能也。以不能名家之学,入趋风好名之习,挟人尽可能之笔,著惟意所欲之言”^②。虽然不是所有诗话著作都是如此,但章氏所说这种情况,的确是大量存在的。章氏重视成一家之言、见专门之学的著述,而轻视随意性诗话、笔记之类,所以推崇《诗品》、《文心雕龙》而轻视诗话,对此学界有不同看法。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章氏的批评,的确击中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要害。他从著述之风的衰退,揭示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缺乏具有理论深度、成体系的著作的原因所在。这个看法,是值得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学者注意的。

章氏虽然没有著述有关文学史的专书,但其文学史学,不仅具有独创的体系,而且具体观点方面,精采纷呈,用他自己评价《文心雕龙》、《诗品》的话来说,也可以说是体大虑周、思深意远,是中国文学史学方面一项重要建树。笔者对章氏学术仅属浅尝,但是在探讨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发现了章氏在文学史学上的巨大贡献,前贤未有深入的论述,于是尝试加以评述,未必已经把握它的全面体系与方法。我们认为,学者们在具体的文学史研究过程中,重新认识并发掘、利用古代文学家们的文学史学,做到融通古今,对于提高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品位,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所以我想将我学习章氏文学史学的体会叙述出来,以与同仁交流。

[作者简介] 钱志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发表过专著《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等。

① 《文史通义校注·诗话》,第559页。

② 《文史通义校注·诗话》,第560页。